

5. 填平农业和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鸿沟

填平农业中的性别鸿沟虽然并非易事，但在这方面仍可取得进展，简单的干预措施有时便很奏效。精心设计的政策、战略及项目能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以有益于两性的方式，在现有的文化规范中发挥作用（插文9）。在获取土地、农村劳动力市场、金融服务、社会资本及技术方面填平性别鸿沟的具体建议涵盖下述举措。

填平土地获取上的鸿沟¹⁷

政府历来重视地权稳定在促进平等、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女性并非总能从一般的土地分配和出让工作中获得收益；当正式权利逐渐赋予家庭的男户主时，她们有时眼看着自己的传统权受到侵蚀。许多政府试图加强妇女在婚内和作为个体所拥有的地权，但这些努力常会受到至今仍偏宠男性的法律和文化行为的联合抵制。

例如在拉丁美洲，继承是土地所有权转让的最常见的方式，但女儿继承土地的可能性比儿子小得多。这里许多国家已经开展法律改革，加强已婚妇女的土地权，但是赋予土地权属的工作并非总能将写上夫妻双方姓名的做法推广开来。在亚洲，妇女通常

拥有土地所有权合法权利，但通常在维护权利方面举步维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方，传统产权制度盛行，社区领导在分配土地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偏向男性。在私有产权盛行的地方，文化规范一般要求男性拥有并继承土地，而妇女只有通过与其男性的亲缘关系才能获得土地。

依法消除歧视

在法律规定的合法土地权利仍存有性别偏见的地方，主要策略便是审查修改所有与土地及自然资源相关的国家立法。尽管土地例律首当其冲，但其他相关立法也应考虑在内。家庭及婚姻法、继承条例及房屋建筑法都是重要的法律领域，在确保男女在土地支配上享有公正待遇发挥了支持作用¹⁸。

认识传统地权的重要性和力量

许多国家已经将土地继承及所有权的正式权利赋予了妇女，但是传统做法——及众多妇女无力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意味着正式法律条款通常并没有得到遵守。在许多国家，当涉及到土地问题时，传统比法律更强大。土地改革部门、农民联盟、村中权威及男户主的反对，会阻挠土地改革的尝试，不能将法定土地权赋予未婚和已婚妇女。如果法定权利被视为不合理，就难以执行；所以承认传统地权、与社区领导合作，

¹⁷ 本节基于粮农组织 2010h 这份广泛评议了相关文献的报告。本领域的重要研究包括 Agarwal (1994 年)，Agarwal (2003 年)，Lastarria-Cornhiel (1997 年)，Deere (2003 年)，Deere 和 León (2003 年)，以及 Deere 和 Doss (2006 年)。

¹⁸ 关于女性及其法律地位的其他信息可见世界银行网站的“妇女、商业和法律” (<http://wbl.worldbank.org/>)。

插文 9

果妈妈：共同努力，做出改变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棕榈油生产由小农主导，油棕的收获过程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男人从树上砍下新鲜的油棕果串，而妇女则捡起地上的散果运到路边，等待榨油厂收走。这些性别之间的角色分工深深根植于当地文化和体制之中。

收获活动通常是家庭劳力总动员。过去人们以为户主可能会用油棕生产获得的收入补偿家庭成员的劳动；然而实际上，女性家庭成员往往徒劳无获，这经常导致家庭内部矛盾，女性不再去捡地上的散果而转身投向蔬菜生产，因为这能让她们取得并保住一份收入。

当地棕榈业意识到，有 60%—70% 的散果没人收集，因而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散果在收获量中所占的比重。首先，他们根据女性的时间特点，推迟了散果收集时间；然后又配发了特制网袋，将散果更轻易地

运到路边。然而这两项措施都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分析女性不捡散果的原因。

终于，在 1997 年实施了果妈妈计划，以确保妇女获得劳动报酬。妇女拿到了收获袋和收获支付卡，根据收集果实的重量获得月收入，直接打入她们的个人银行账户。结果，参与计划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运到榨油厂的散果数量也明显增加。到 2001 年为止，小农油棕收入中有 26% 是给妇女的直接支付。男性反应更积极，因为劳动性别分工保持不变，而由油棕收获引起的家庭内部矛盾却减少了。

资料来源：Kosczberski, 2001 年和 Warner 及 Bauer, 2002 年。

对确保妇女权利受到保护而言举足轻重。确实，加强寡居和离异妇女的传统土地使用权，即便在获得完整所有权存在阻力的情况下，也可以为她们提供更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教育并根据性别问题目标考核官员

当地土地官员可能不了解关于性别平等的法律和目标，或者缺少执法的机制、手段和意愿。立法需要有配套法规及性别问题的规定和准则等，并就执法时的性别立场对农业部、土地机构和其他单位的官员进行教育。对行使和掌管土地权的各单位员工也需

要进行相关培训，包括土地登记处、地籍办公室、土地权属机构、地方主管部门及法院等。这些部门的就业性别平衡也能发挥作用。应酌情将官员的绩效考核与相关性别平等目标挂钩。妇女团体的参与能推动实现这些性别平等目标。而且，应监测土地获取和地权稳固上设定的性别问题目标，官员必须为实现这些目标负责。

在尼加拉瓜，由妇女事务办公室帮助协调的产权法律化进程工作，包括官员的性别敏感度培训、吸收妇女参与进程的信息宣传活动等（粮农组织，2010h），这使男性和妇女逐渐认识并接受了赋

予妇女的土地权，虽然需要开展数轮培训。

对妇女进行地权教育

提高妇女的法律素质、加强信息的传播与获取、建立配套法律服务，对促进土地工作的性别平等而言不可获缺。法律素质意味着妇女了解法定权利，并知道如何行使及保护这些权利。执行土地工作的官员必须在性别平等规定以及联合权属方面积极教育男性和妇女，而不能将做决定视为配偶之间的私事 (Ikdahl, 2008 年; Brown, 2003 年)。

民间社团能协助提高法律素质。在莫桑比克，当素质提高项目含有土地立法内容或非政府组织持续反复发布土地法律信息时，妇女更可能知晓她们的土地权 (粮农组织, 2010h)。

正因为地权问题无比重要，因此也常现纠纷，希冀维权的妇女可能会遭受家庭和社区的压制，这方面的法律保护规定及负担得起的法律服务因而尤为重要。员工接受过土地问题培训的流动律所，可能在土地正式权利工作中提供有益的问题解决方案。

确保倾听妇女的声音

具有实质意义的代表性是协助妇女获得既定权利征途上的重要一步。妇女团体能有效推动地方参与，在各个层面建立共识并提高意识。妇女在决策机构一般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而妇女团体发挥的作用尤为可贵，通常能够迫使政府工程让妇女平等参与进来。

卢旺达有一例，说明了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如何共同合作稳定妇女的土地权。卢旺达成功改革了继承及地权方面的立法，现在，这些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法律环境跻身最理想环境之列。由于妇

女参与当地政府管理，新法律才得以制定。2003 年宪法规定，所有决策代表中必须有 30% 是妇女。

无独有偶，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负责解决土地争端的村土地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其中三名必须为妇女 (Ikdahl, 2008 年)。埃塞俄比亚的土地认证过程，人们称赞高效低廉、迅速透明，性别平等目标不断提高，因为当地土地管理委员会必须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老挝妇女联盟开始参与土地权属工作，妇女才获得土地所有权。妇联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积极工作，向男性和妇女宣传土地权属和法律权利，协助建立性别敏感程序，培训地方工作人员学以致用。

妇女必须是土地执行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社区成员培训成为律师助理、地志学者及冲突调解员，有助于积累社区技能，提高解决妇女关心问题的可能性。

调整官僚办事程序

一些措施简便易行，比如在土地登记表上留出填写两个名字的空间等，却可成为鼓励联合权属、保护已婚妇女权利的有力工具。例如，巴西在 1988 年土地改革后确保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土地权利，但是登记为受益人的妇女为数不多，因为登记表中只提到她们是家属。2001 年修改了表格，列出配偶双方姓名可作为共同申请人或受益人 (Deere, 2003 年)。

农村妇女通常缺少一些必要的文件 (例如出生记录) 来获得土地权属，所以有必要努力获得这些文件。在土地证书上贴上持有人的照片，便能减少可能发生的欺诈和操纵。埃塞俄比亚的土地工作要求妇女的证书上要有她们的照片，

以协助确保她们掌控土地。这种措施得到了称赞，因为提高了妇女地权的稳定性，并方便了妇女出租土地 (Deininger 等人, 2007 年)。

收集分性别数据用于政策设计与监测

收集分性别数据有助于改进土地权属工作的设计及效果。例如，柬埔寨的一个土地权属项目在实施前先进行了社会评估，获得了关于性别不平等及土地所有权的有益见解，随后用以助推项目执行。事实上，有 78% 的新土地证书是以配偶双方名字发放的，说明这个项目在确保妇女参与度上取得了成功。

填平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鸿沟¹⁹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妇女而言，劳动力是重要资产。农业提供了自主就业和工资型就业渠道，因而农业至关重要，对于缺乏非农就业培训和渠道的妇女（及男性）来说尤为如此。就此而言，农业也为减贫做出了贡献。农业发展催生了劳动力需求，也给非技术工种的实际工资添加了上行压力，这两点对贫穷的男性和妇女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对于后者而言更是如此（见第三章）。

就业和工作质量均重要这个原则，反映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1 的目标 1B 中：“让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获得体面劳动”。联合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B 而设置的“体面工作”议程追求推动四大目标：创造就业以及社会保护、执行劳工标准及规定和社会对话。

针对妇女的多重取舍

与走向劳动力市场最紧密相关的性别问题，也许就是生产与生殖角色上的时间分配问题，两种角色中都渗透着社会规范和育儿责任。正如插文 3 所述（见第 14 页），在多数农村地区，女性承担着抚育子女、准备食物及拾柴取水等其他家务的大部分相关工作，同时还大量参与无偿的农业生产。若把家庭活动全部考虑在内，妇女通常比男性的工作时间更长。妇女在时间分配上面临诸多权衡取舍，如果没有节省劳动力技术方面的政策与投资，参与劳动力市场通常不在考虑之列，即便有时机会在召唤。关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将在“填平技术鸿沟”一节中单独讨论（见第 56 页）。

改善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状况，也需要政府通过强化物权、提供路水电等公共产品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土地等资产和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限制了她们自主择业。薪柴、水和市场的获取若容易一些，便可缓解时间上的束缚，从而使她们参与就业和自主就业的能力得到明显改观。妇女从一开始就要参与投资规划。例如在秘鲁，妇女直接参与了一个农村道路项目的设计，确保了项目优先符合她们的需要。项目修缮的不仅是村村通的道路，而且还辐射到了妇女常用的许多非机动车运输小路，那些其他道路项目不予理睬的小路。拾柴取物上花费的时间从而减少，使妇女更多地参与到市场和集市活动中，据称这些妇女中，43% 的人获得了更高收入（世界银行，2008 年）。

减少人力资本上的性别不平等

妇女在文盲中的比例依旧明显过高（联合国，2009 年）。提高获得教育和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会有助于缩小

¹⁹ 本节分析参考了 Termine (2010 年)。

工资差距，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妇女获得更多机会来实现个人多元化。在农业提供女性主要就业渠道的国家，技能培养应解决相关技能和知识差距问题，并将重点放在推广服务和职业培训上。某一领域的就业几率高，也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选择。在菲律宾，妇女比男性更可能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孩的教育学成率较高(Quisumbing、Estudillo和Otsuka, 2003年)。

政策干预需要集中在女孩入学和卫生措施上，如针对女性一生中特定时期的需求而实施的免疫和营养措施等。有条件转移支付(见插文8，第44页)，通常以家庭妇女为目标，已被成功用于改善妇女儿童的教育、健康与营养(Quisumbing和Pandolfelli, 2010年)。

利用公共工程

一般来说，非正规劳动就业是无技能女性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公共工程能够支持非熟练工人，包括妇女。这些公共的劳动力密集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提供现金或食物支付换取劳动。此类项目具有诸多优势：为穷人提供了收入转移，而且常用以在一年之中的“萧条”或“饥荒”期稳定收入；解决了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农村道路、灌溉、集水设施、植树、学校和卫生所等)；具有典型的自身针对性，鉴于其效益水平相对较低、体力劳动重(Subbarao, 2003年)，因此比其他许多安全网措施的管理成本更低。它们在政治上也很受欢迎，归功于受益者按照要求必须承担劳动(Bloom, 2009年)；而若想争取支持来实施现金直

接转移，特别是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则棘手得多(例如Behrman, 2007年)。

埃塞俄比亚生产安全网计划于2005年启动实施。这项计划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粮食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惠及了700多万长期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支持令众多女性受益。在社区一级，建造集水设施和土地复垦工程无论对男性还是妇女而言均有积极推动。妇女在公共工程中经常与男人一起劳动，男人们对妇女工作能力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也是妇女的一大收益。此项计划还帮助提高了家庭食物消费，并且为满足子女在衣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了花销(Holmes和Jones, 2010年)。这些收益对女户主家庭来说弥足珍贵，她们在计划实施之前，几乎没有获取帮助的可选渠道。

在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于2005年实施，旨在提高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任何来自农村家庭的成年人，若愿意在公共项目中从事非熟练手工劳动，赚取法定最低工资，那么法案为其提供每年工作100天的法律保障。法案同样致力于为农村妇女赋权，通过配额方式来推动妇女步入劳动大军行列：此项目下，每个邦注册并要求工作的全部工人中，至少三分之一必须是女性。除此之外，法案还规定男女同酬。妇女在项目上就业，尤其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获得收入时，她们的地位似乎得到了加强。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在设计中还包括提供托儿场所，作为促进妇女参与的一项手段，但提供育儿设施在具体操作上仍存在巨大挑战(Jandu, 2008年；Holmes和Jones, 2010年)。

加强女性的权利和话语权

女性饱受缺乏话语权之苦，特别是在农村社区，这既是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也是结果。体制进行变革，便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协助得到体面的工作，实现经济与社会赋权，同时减少农业非正规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公共政策和立法能够影响性别不平等背后的公众态度和价值观。政府立法对于保障公正的就业条件、保护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人员而言非常重要，而非正式就业对妇女而言又极为重要。例如，政府可以支持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妇女组织。与此同时，集体谈判和推荐性标准同正式立法一样重要。农村生产者组织和工会的关键作用体现在，能够协商更公平和安全的雇佣条件、更高的产品价格和工资，能够促进两性公平和体面就业。

不过，多数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的机构（如生产者组织、合作社、工会、合同农业方案）通常都由男性管控，因此需要在这些组织的会员和领导层中对妇女进行有效赋权，确保农村妇女拥有更强大的声音和决策权²⁰。与此同时，有必要通过培训男性和女性代表，来提高代表性机构中的性别敏感度，因为性别敏感度不会因妇女的加入就自动提高。妇女代表处理问题时不一定总能采用性别敏感方式，特别是当性别因素被认为太过教条、出现强大阻力、或与男性利益冲突时。性别敏感度培训对于那些与女性打交道和执行偏重性别问题的政策的机构员工来说也很重要。

²⁰ 有关女性议会代表性的更多信息参见“各国议会联盟”网站(www.ipu.org)。

填平金融服务鸿沟²¹

妇女获取金融服务取决于她们在社区和家庭中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地位。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填平性别鸿沟所需的一些干预措施，与其他资产类别所需的干预措施类似。例如，在法律和习俗限制妇女自行开设储蓄账户、借贷或购买保单的国家，向妇女提供签署金融合同的平等权利是关键的第一步。

小额贷款项目有效克服了妇女进入正式信贷市场时面临的障碍，这在第三章已有分析。提高妇女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思考讨论如下。

宣传金融知识

金融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当提供金融基础知识培训，来确保妇女能够对不同的产品进行比较，并在清楚认识现有产品的特征和条件的前提下做出选择(Mayoux和Hartl, 2009年)。这些努力可能包括如下步骤：在妇女可到的地点或通过妇女可接触的渠道发放信息和宣传资料；简化申请程序以适应妇女的文化与算术水平；简化保险单合同，解释条款时使用即使识字不多的妇女也能轻易理解的语言和例子。

设计满足女性需要的产品

过去几年中，保险产品在小生产者和农村地区的推广非常明显。例如，作

²¹ 本节材料基于Fletschner和Kenney(2010年)。本领域的重要研究包括Berger(1989年)、Goetz和Gupta(1996年)；Pitt和Khandker(1998年)；Hashemi、Schuler和Riley(1996年)；Baydas、Meyer和Alfred(1994年)；Fletschner(2009年)、Fletschner和Carter(2008年)；Ashraf、Karlan和Yin(2010年)；Pitt、Khandker和Cartwright(2006年)、Holvoet(2004年)、Hazarika和Guha-Khasnobis(2008年)、Besley(1995年)；Boucher、Carter和Guirking(2008年)；以及世界银行(2007a)。

物险和畜牧险越来越多地以安全网的形式提供给农民。但一般来说，这些产品并未对性别差异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女性对这些产品的获取程度也不清楚。有一个例外颇为与众不同，那就是BASIX采取的方式。BASIX是印度一家大型小额贷款机构，向易旱地区自主就业妇女协会的会员提供气候保险(Fletschner和Kenney, 2010年)。

一些多边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向妇女提供健康保险(表2)。疾病可给资

源贫乏家庭的收入带来冲击，妇女更是首当其冲，因为她们通常承担照顾患者的职责。家庭成员患病，会减少妇女参与创收活动的 ability，并削弱她们影响家庭决策的能力。

生命中的一些大事，如出生、死亡、婚嫁和其他文化仪式，同样也会对农村家庭形成冲击。这里描述的许多小额保险计划包含了怀孕和与生育有关的支出。有些计划提供了人寿和丧葬保险(Sriram, 2005年; Mgobo, 2008

表 2
针对妇女健康保险产品的优选案例

| 提供方与国家 | 受益人 | 详细说明 |
|--|--|---|
| 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 孟加拉国 | 起初只有BRAC会员；2007年起面向所有社区成员(贫困的农村妇女是投保人) | 开始日期：2001年 会员：10000个(截至2004年)(Matin、Imam和Ahmed, 2005年) 结果：55%的人第一年之后没有续保；越是贫困的家庭越不了解这个项目，越富裕家庭越可能参保；一些保户认为难以支付年度保金；其他参保但未使用服务的人认为这是种“浪费”(同上) |
| SKS 孟加拉国 | SKS借款人，主要是妇女(覆盖配偶和最多两个孩子) | 开始日期：2007年，2009年扩展，可以覆盖配偶(通常是丈夫) 人数：210 000个(截至2008年)；要求所有新老借款人全部参保(截至2007年)；(Chen、Comfort和Bau, 2008年) 结果：16—30岁女性是最频繁的用户(同上) |
| 自主就业妇女协会(SEWA) 印度 | SEWA会员及非会员(女性是投保人) | 开始日期：1992年 人数：110 000个(截至2003年)，三分之二来自农村地区(Ranson等人, 2006年) 结果：创立宗旨是降低客户面临冲击时的整体脆弱性，但处理过程缓慢造成顾客的成本高；最初所有借款人强制参保；当转为自愿后，80%的人弃保(McCord, 2001年) |
| SPANDANA 印度 | 借款人(强制性的，作为贷款产品的一部分)(Sriram, 2005年；扶贫协商小组(CGAP)，2004年) | 开始日期：2003年(Sriram, 2005年) 人数：84 000个，包括配偶(截至2004年)(扶贫协商小组, 2004年)。2007年，96.5%的借款人是女性(Mix Market, 2010年)。 |
| 苏丹港小企业发展协会(PASED)/为赋权脱贫而学习(LEAP) 苏丹 | 妇女非政府组织成员(个人以低廉成本获取国家健康保险)(Mayoux和Hartl, 2009年) | 开始日期：2007年(Mayoux和Hartl, 2009年) 人数：不详 |
| 肯尼亚妇女金融信托有限公司(KWFT) 肯尼亚 | 中低收入妇女，可选择覆盖家庭成员 | 开始日期：2008年 人数：不详，可能100000人(全部KWFT成员)(Mgobo, 2008年) |
| 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和世界妇女银行(WWB) (全球) | WWB附属机构(妇女小额贷款机构成员) | 开始日期：2009年 人数：不详，但WWB拥有2100万成员(WWB, 2010年) |

年)，但是非正式的安全网，例如丧葬协会等仍是稳定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渠道，对妇女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丈夫去世，她们面临的可能是失去一切财产 (Dercon 等人，2007 年；Mapetla、Matobo 和 Setoi，2007 年)。

营造对妇女友好给妇女赋权的文化

贷方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提倡一种带有性别意识的组织文化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09 年)，应吸收妇女参与讨论、决策和规划过程，向她们提供服务，向她们征求意见。营销策略、促销宣传和服务应考虑性别差异。吸收男性参加项目和团队，可以对性别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获得项目成果，但同时冒着失去妇女核心地位的风险 (Armendáriz 和 Roome，2008 年)。

大量事实显示，向妇女贷款有助于丰富收入渠道，实现家庭增收，并会带来其他收益，如丰富生计、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等。然而，如果妇女并不掌控积累或增加的资产，这么做也不一定实现妇女赋权 (Garikipati，2008 年)。

意在增强妇女地位的产品有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土地或房产购置贷款，要求必须以妇女姓名登记；印度家庭企业信贷储蓄的父母贷款，用于为女儿们购置资产，鼓励她们用此创收，推迟结婚，累积结婚时可以带走的资产 (Mayoux 和 Hartl，2009 年)。类似系列产品中，有一组专门用于为社区其他妇女带来间接受益 (Mayoux 和 Hartl，2009 年)：例如，给雇佣妇女的企业或提供儿童看护等服务从而有益于其他妇女的企业提供的贷款。

利用科技和创新型交付渠道

科技创新，如利用预付卡和手机计划还贷或现金转账等，降低了长途跋涉的必要性，令妇女更易于获得资金，使她们得以绕开束缚手脚不得走动的社会枷锁，得以破除阻碍与人联系沟通 (Duncombe 和 Boateng，2009 年)。另有一例，马拉维一家收储小额存款的银行引入了创新做法，给予妇女更大的收入支配权，如使用生物识别卡，只有持卡人才能从账户和开户行取款，而不需要身份证，农村很多人没有身份证。这家银行成功地吸引了众多妇女来此开设银行账户 (Cheston，2007 年，引于 Quisumbing 和 Pandolfelli，2010 年)。

巴西、印度、菲律宾和南非等一些国家的金融机构能够通过邮局、加油站和商店以低廉成本获得农村客户，很多电信服务提供商允许客户进行支付或转账 (世界银行，2007a)，这些触手可及的门户对难以到达商业中心区的农村妇女而言大有裨益。

通过妇女团体填平社会资本中的鸿沟

累积社会资本可以是改善信息交流和资源配置、共担风险、保证妇女呼声在各级决策层得以倾听的有效途径，而妇女团体等社区组织可以是催生社会资本的有效工具。妇女团体可以生产合作社、储蓄协会和营销团队等形式推动生产，协助妇女掌控获得的额外收入，孟加拉一个混合养鱼项目便证明了这一点。项目成功提供额外收入的同时，妇女在家庭和社区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 (Naved，2000 年)。

通过整合资源达到规模优势有助于妇女克服个体农民面临的一些制约。在肯尼亚，女性农民整合地块，组织起来成立了储蓄协会，携手应付囤积商和贸易商。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在获取土地、贷款和信息方面遇到的问题 (Spring, 2000 年)。实现规模优势方面一个令人触动的例子，便是 1972 年成立于印度阿默特巴德的自主就业妇女协会 (SEWA)。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由非正式部门就业的贫困妇女组成的小型会员制组织，而今却已拥有遍及印度 14 个邦的百万名成员，目标是成立与服务、市场准入和公平待遇有关的团体。它最大的合作社是自营妇女银行，2007—2008 年间有 30 万户头，存款额达 1660 万美元 (见插文 10)。妇女不一定总能进入树大根深的协会和网络，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例子便可以说明。这里的妇

女发现，很难进入男性主宰的与正式植物育种体系有关的网络体系 (Song 和 Jiggins, 2002 年)。成员全部是女性的妇女团体可以发挥垫脚石作用，为成长为性别混合团体或加入成熟团体打下基础。

事实证明，自助团体是联系妇女和金融机构的有效方式。此类团体可能活跃在村级基层，一般要求成员定期召开会议，从成员手中收集积蓄储存到农村银行，或借给其他成员。当一个团体证实有还贷能力时，乡村银行一般会对其的积蓄进行杠杆调节，向其提供配比资金用于成员的农业用途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 2009 年)。有证据显示，通过团体开展活动，有助于妇女支配手中贷款，提高对妇女经营企业投资的收益 (Garikipati, 2008 年)。

插文 10 印度的自主就业妇女协会 (SEWA)

自主就业妇女协会 (SEWA) 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妇女的充分就业和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主就业妇女协会成立了诸多小型资助团体，每月在成员田中、家里或社区召开会议。农民们选择加入这些团体来分享喜怒哀乐，并共同解决问题。例如，在古吉拉特邦的萨巴坎塔县，自主就业妇女协会支持妇女小农创建了一个联合会：萨巴坎塔女性农民协会，并在 7 个农村实施了流域保护工程。

自主就业妇女协会提供协助的方式包括由专业组织提供的能力建设。这些专业组织对协会成员进行管理技能和领导力培训，提供自组织和集体

行动培训，帮助会员成长为信心十足的领导。妇女学员的识字率低是有效实施培训的主要挑战。协会还提供功能性识字培训，一般分组进行，由社区一名当地培训者协助完成。培训重点内容是阅读能力，并根据妇女的具体需求而设计。

协会的乡村资源中心通过自助团体帮助农民了解新技术的潜在优势，评估它们是否适用并参与技术开发过程。资源中心还向农民提供优质投入品、市场信息和技术指导。协会的合作社是古吉拉特邦种子公司授权的种子经销商，及时提供定价合理的优质种子 (比市场价格最多可低 20%)。乡村资源中心通过定期

团体是增强妇女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但有时会产生对此机制的过分依赖。妇女团体如其他任何集体行动一样，面对着挑战与成本。会费可能将资源贫困的妇女排斥在外，土地所有权等入会条件可能将无地妇女拒之门外，而会议召开的时机与长短可能干扰妇女的日常劳动。新成立的团体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建立成员之间的信赖。妇女也可能不原意加入某个团体，因为它处理的不是她们最为关切的问题。Quisumbing 和 Pandolfelli (2008 年) 记述了菲律宾一个项目的研究结果。这个项目努力吸引妇女去对一个湖进行观察，监测评估一些水土保持方法是否可以减少淤积。然而妇女的参与率不高，因为她们主要关心的是健康问题。当项目开始强调健康与水质的关系时，妇

女的参与率提高了。了解加入动机对于保持团体的持续发展而言举足轻重 (Pandolfelli、Meinzen-Dick 和 Dohrn, 2008 年)。决策者和组织者需要清楚了解成立团体时力图解决的具体问题，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利用现有（有时是非正式）团体和网络，证实比凭空成立一个新团体更成功有效。

需要联合行动时，混合性别团体会更加富有成效，如自然资源管理等活动 (Pandolfelli、Meinzen-Dick 和 Dohrn, 2008 年)。为吸引妇女积极加入，混合团体必须解决妇女问题，必要时在成立之际应允许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加入 (Meinzen-Dick 等人, 2010 年)，也应该允许妇女的声音得到倾听。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案例研究发现，在只有妇女们参加或参会男女数量相当的会议上，妇女发表见解的意愿增强了 (German 和

发送短信等方式，将产出品当前价格信息通知每个村落的妇女带头人，从而令自助团组能够议价，获得更好的产品销售价格。

促进小农市场准入的各组织团体中，农村销售网络 (RUDI) 作用独特。它向村民供应常用物品，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产自各县的谷物、香料和盐巴输送到一个加工中心，然后从这里分送到各销售中心。通过这种方式，农村销售网络向农民团体提供了一个销售窗口，并向女商人提供了就业。

自主就业妇女协会采用的方式出奇得成功，因为是一体化的方式。自助团体和自主就业妇女协会通过小额贷款和保险代理公司、以及协会自身

的机构（如培训机构）和自身的通讯设施（如广播电台）密切联系。协会的方式值得信赖，并具有包容性，因为它拥有基层基础以及自助团体的高效服务。协会也力量强大，因为不仅内部团结，而且与外部伙伴如政府部门、大学、研发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公司之间联系密切。

协会的 2 140 个自助团体，通过提高妇女收入实现粮食安全并帮助她们抓住机遇，令妇女的生活改头换面。例如，萨巴坎塔女性农民合作社，协助女性农民重获 71 个村庄的 3 000 公顷河谷地，年收入从平均 5 000 印度卢比（约 112 美元）提高到了 15 000 印度卢比。

Taye, 2008年)。基金管理和收益分配等机制的具体做法,以及领导岗位的妇女比重也在敦促妇女加入团体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能否组织起混合团体由社区的性别隔离状况决定。性别隔离程度高的社区,单一性别团体可能会产生有利于妇女的理想成果(Pandolfelli、Meinzen-Dick和Dohrn, 2008年)。然而有时候,将男性排斥在外会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安古迦岛的饭店供应青蟹的新生活战略项目中,男士因被排斥在外而感到愤怒异常,从而导致交易和投入成本增加,因为妇女不得不仰仗那么几个男渔民提供种蟹和饲料(Coles和Mitchell, 2010年)。触及当地社会文化境况的项目应避免“想当然”的做法;而应在考虑具体情况和内在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干预。

■ 填平技术鸿沟

填平在众多技术获取方面存在的性别鸿沟,可能会有助于解放妇女时间,将节省的时间用于更加多产的活动,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市场收益,并赋予她们做出更有利于个人和家庭的选择权利。填平技术鸿沟,要求现有技术满足女性农民的首要需求,要求妇女了解这些技术的用途,并要求妇女有办法掌握这些技术。

开发技术创造环境满足妇女需求

上述章节证实,农村妇女每天工作时间超长,在耕作养殖、工资性就业、照料子女和其他家庭义务等各种活计中奔忙。砍柴挑水做饭等家务占据了大量时间,阻碍了妇女承担更多的生产性活

动。例如,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平均每天到主要水源处汲水四次,每次需要花费约25分钟(Thompson等人, 2001年)。采用简便易行的技术,便可以减轻其中很多活计带来的沉重负担,减少所需时间。

水对于农户来说举足轻重,是农业和家务之必备,但就用水优先重点而言,男人和妇女却常常持有不同观点。妇女经常负责挑水家用,如饮用、清洁和卫生。将水源引入村中,会大大缩短妇女和女童汲水所需时间(农发基金, 2007年)。例如,在摩洛哥6个农村省份开挖修复水源设施,将妇女和女童用于汲水的时间缩短了50%—90%。这些省份的女童小学入学率在仅仅四年间便提高了20%,一定原因便是女童用于汲水的时间减少了(世界银行, 2003年)。

那些实现多种生计目标、妥善考虑性别问题的水利项目则更有可能持续下去(Quisumbing和Pandolfelli, 2010年)。例如津巴布韦曼兹维尔村的井眼修葺项目,男人和妇女都参与了决策过程,共同决定新取水点的位置和使用的技术,并就新水源维护对妇女进行培训。积极参与让妇女对水源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比如她们发起了储蓄机制,提供配件购买资金。项目的另一成果就是,最终得到修葺的井眼数量比预期多了四倍(Katsi, 2006年)。

收集做饭用的薪柴也占用了妇女大量时间,而且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例如,塞内加尔的农村妇女每天要扛着超过20公斤的木柴走上几公里的路(Seck, 2007年)。森林砍伐以及干旱等恶劣气候,都会增加拾薪时间。省柴节能炉能将薪柴需求量降低40%—60%(粮农组织, 2006b),还能减少室内污染和做饭

时间。在本地生产炉具还能为农村手工业者提供创收机会。例如，在肯尼亚西部，采用吾辈思 (Upesi) 快炉后大大减少了烟尘。使用这种炉子的妇女称，每月能节省约十个小时的时间。这种炉子还比用三块石头搭成的传统灶节省 40% 的燃料，使用寿命大约为四年。这种炉子由当地的妇女团体生产，从而为农村妇女创造了收入机会 (Okello, 2005 年)。小林地、农林间作和改良休耕制度都会拉近薪柴与家的距离，进一步减少拾薪时间。实施这些措施需要有稳定的地权和人力财力的投入，投资收益只有在若干年后才会实现 (粮农组织, 2006b)。

称心合手的农具也能减轻妇女的田间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时间。除草和收获后劳动等常由妇女操劳的农活中，农具在使用上通常并不分男女。事实上，技术开发人员往往认为技术是中性的，但与男性相比，妇女一般体重较轻、身高较低，可能不具备同样的肌肉力量 (Singh、Puna Ji Gite 和 Agarwal, 2006 年)。改进农具会方便妇女的整地、播种、除草和收获活动。例如，在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开展的一项案例研究显示，与传统的短柄锄相比，长柄锄能够减轻妇女的劳动负担，但这在一些国家却不能接受，因为对他们而言直起身来便意味着懒惰 (农发基金 / 粮农组织 / 东南非农场层面实用研究方法组织 (FARMESA), 1998 年)。在印度开展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用剥皮器剥的花生比徒手剥的花生多 14 倍，而且还大大节省了妇女的体力。整地时使用专门用于菜地打垄的新工具，妇女们每小时打垄的数量能翻一番 (Singh、Puna Ji Gite 和 Agarwal, 2006 年)。因此，应注意开发适宜实用的技术，同时协助妇女获得技术。新技术推广

前，先对家庭和社区开展基线调查，可能有助于预测新技术对男性和妇女的影响 (Quisumbing 和 Pandolfelli, 2010 年)。妇女参与农业研究程度越深，教育程度越高，可能也会推动开发妇女友好型技术。

高产、抗虫抗病的改良品种减少了作物管理时间，因此也能节省劳力。一些作物，例如木薯和其他根茎类作物，劳动力需求较低，田间管理更灵活。错峰收获的品种可以缓解劳动力瓶颈。病虫害综合管理技术能降低劳动力需求和施药成本，因而降低了农民暴露于危险化学品风险，还能提高产量。保护性耕作或免耕减少了整地和除草所需的劳动力，因田里有覆盖作物，不用整地便可直接播种 (粮农组织, 2006 b)。提高土壤肥力的生物固氮技术，比如农林间作技术创新或食用豆类种植，能提高生产力，节省劳力。

改善推广服务

推广服务对于传播技术和良好规范而言十分重要，不过如何接近女性农民仍需认真思考。一些 (并非所有) 地方的文化，更能接受女性农民与妇女推广人员接触。不论性别如何，推广人员必须对妇女客户的需求和制约保持敏感。向妇女提供推广服务，必须考虑到妇女扮演的所有角色；妇女作为农民的需求通常被忽略，而针对家庭责任的项目通常受到眷顾。

聘用女性推广人员可以成为接近女性农民的有效方法。例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将女性推广人员的比重提升至 30%，因为许多女性农民表示，“觉得与女性推广人员讨论问题更自由，而且时间要求能得到更好地满足” (Duc、Magayane 和 Temu,

1997年)。不过,这种偏爱并非到处存在;很多情况下,受过适当培训的男性推广人员可能会提供同样有效的服务。

男性推广人员必须敏锐地认识到农村妇女的实际状况,向妇女提供的信息质量必须提高,这就要求对妇女状况开展实际认真的分析。通过将妇女分成小组的方式,或视情况分别向男性和女性农民提供培训方式提供服务,可能会克服文化障碍。为应对时间和流动性方面的制约,推广体系还必须更加创新,更加灵活。的确,时间的制约、交通工具使用受限及潜在的社会文化障碍,牵制着女性农民不能离开村子,与男性农民相比,妇女流动性较差。妇女劳作通常具有季节性,这可能会在时间上与推广培训项目相冲突。

埃塞俄比亚政府大力推动推广服务的改善,使其更好地应对性别问题,于是授权给国家级和地区级农业局,自行开展与妇女活动紧密相联的推广服务,鼓励妇女参加每个项目,帮助妇女获得农业投入品(Buchy和Basaznew, 2005年)。乌干达妇女参与“农民到农民”模式的培训和推广,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插图11)。

扩大农民田间学校

事实表明,农民田间学校(FFS)是向女性农民赋权、传授知识的有效参与式方法。例如,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妇女们在加入农民田间学校后,更可能采用如良种、养殖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主要技术。在这三个国家中,妇女在农民田间学校学员中都是平均占到半数,并从参加学校活动中获得了重大收益。比如在畜牧生产带来的收入增长上,来自女户主家庭的学员

比男户主家庭学员高出23%,并且人均农业收入几乎实现翻番。农民田间学校对妇女及贫困农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来说均可轻松进入。农民特别重视参与式的学习方法,珍视使用新技术在田间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Davis等人, 2009年)。

若农民田间学校针对的是女性学员参与度,那么时间上的约束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斯里兰卡的一个关于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农民田间学校案例调查发现,单只一季当中就要占用15个半天开会(Tripp、Wijeratne和Piyadasa, 2005年)。与女性农民相关的作物偏好或作物管理同样也决定了妇女参与程度。在秘鲁,一项参与式马铃薯研究活动仅吸引了约12%的女性参与,因为妇女们认为马铃薯是一种“男性”作物,而一个马铃薯块茎播种、收获及品评的课程中的妇女参与度达60%,因为这些活儿被认为是“妇女”做的(Buck, 2001年; Vasquez-Caicedo等人, 2001年)。

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由于需要较高的初期投资以及巨大的经常性费用,农民田间学校在财力上无法做到可持续。比较发现,费用因国家和作物的不同而差异很大;并且,如果项目管理人员学会使用本地的培训材料、用本地工作人员替代国际专家、增加学员人数,则每个农民的平均成本会有所下降(van den Berg和Jiggins, 2007年)。为了增强农民田间学校对妇女的影响,确保学校长期存在,需要培训女性农民如何进行有效沟通,传播所获的经验,这一点很重要,有助于妇女成为其他农民田间学校的教学辅助人员,或向未参加田间学校的农民交流沟通。

插文 11

乌干达农村可持续生计项目中的妇女¹

乌干达东部卡穆利地区于2004年开展了一项农村可持续生计(SRL)项目，女性特点显著。它的首要目标是改善家庭和社区层面的粮食安全、营养和健康状况，其他相关目标包括扩大收入来源、提升收入水平、增强抗压和抗冲击能力以及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农村可持续生计项目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农村可持续生计中心、马凯雷雷大学农业系以及乌干达非政府组织“志愿求发展”(VEDCO)合作开展的。

该项目采取了农民到农民的培训推广方式，示范推广关键的田间管理技能，比如：能够确保产量、防控病虫害的香蕉或木薯种植方法；通过堆肥提升土壤肥力；种植和使用营养丰富的作物，例如籽粒苋及富含维生素A的红薯等。项目还强调繁育和制种园建设、产后管理储存、牲畜育种和喂养水平改善、营养健康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农业企业发展、市场营销、农民团体建设等。

社区会议召开后，通常在储蓄俱乐部等现有自助团体的基础上组成各农民团体。1 200名农民团体的成员、组长和教员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社区的农村发展推广工作人

员中有58%，社区营养健康工作者中有75%，委员会委员有76%，执委会委员有71%。

在接受培训和支持后，农村发展推广工作者以及社区营养健康工作者向农民团体的成员以及社区的其他成员或其他社区的成员提供培训和宣传服务，受益的其他家庭已超过2 000个。

由于参加了项目，妇女的人力资本在经过培训后得以提升，也通过经验积累、领导技能开发、营养健康改善、因承担了宝贵知识来源的角色而得到整个社区的尊重而得以提升。在社会资本方面，妇女全面参与了农民团体及新兴的销售协会。另一个关键成果在于，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的粮食安全状况。

卡穆利地区三方合作中的创新之举，现正逐渐成为“志愿求发展”组织在其他九个地区为25 000位小农服务的农村发展支持项目的主流方式。

¹由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可持续农村生计中心社会发展部副主任、社会学教授 Robert Mazur 撰写。

主要信息

- 各类农业投入品、财产和服务上存在的性别鸿沟是可以填平的，这需要多方努力，需要政府、民

间社团、私营部门和个人共同采取多项措施，但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消除法律上的歧视，做政策、规划决策时考虑性别问题，使妇女在各级决策过程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 填平妇女在获取土地和其他农业资产上的鸿沟，需要修改法律以保障同等权利，需要教育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人员并让他们对维护法律和赋予妇女权力负责，以确保妇女了解并主张自身权利。
- 妇女走向农村劳动力市场，需要通过引入省时省力的技术、提供公共服务解放妇女时间，需要通过教育提升妇女的人力资本，需要消除就业歧视，需要利用公共工程。
- 填平金融服务上的性别鸿沟，需要进行法律和体制改革，满足妇女的需求、应付制约因素，需要大力丰富妇女的金融知识。创新型交付渠道和社会化网络能够降低成本，让农村妇女更易获得金融服务。
- 通过实施包含性别问题在内的参与式研究和技术开发项目，提供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推广服务，扩大农民田间学校，可以促进妇女对农业技术的获取。
- 妇女团体及其他形式的集体行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共担风险、发展技能以及建立信任，成为妇女积累社会资本、应对其他领域存在的性别鸿沟的有效手段。妇女团体可以是垫脚石，去填平在加入其他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上存在的性别鸿沟。